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库



张友仁回忆文集

张友仁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张友仁回忆文集

张友仁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友仁回忆文集/张友仁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库)

ISBN 978-7-301-20549-5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张友仁—回忆录 IV. ①K8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0265 号

书 名: 张友仁回忆文集

著作责任者: 张友仁 著

责任编辑: 郝小楠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549-5/F·315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em@pup.cn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13.5 印张 265 千字 插页 2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总 序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教育和科研基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我国综合大学中最早建立的经济系科,也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基地。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1902 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商学科,1912 年严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始建经济学门(系),1985 年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为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学院。

1901 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一名《原富》),标志着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正式引入,此后北京大学一直是中国传播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镇。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也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至 1931 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系陈启修教授首次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功不可没。因此,不论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引入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北大经济系都是领时代潮流之先,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拥有深远历史渊源和悠久学术传统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一个多世纪中涌现出马寅初、陈岱孙、赵迺抃、樊弘、陈振汉、胡代光、赵靖、厉以宁等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学养深厚、影响深远的大师级人物,为我国经济科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2012 年是一个对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年份,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已走过了 110 周年历程,北京大学经济学门(系)也迎来 100 周年的隆重庆典。为了庆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创建 100 周年暨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建立 110 周年,我院编写了这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 周年纪念文库》,旨在深入梳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历史底蕴和历史成就,同时也希望从一个世纪的经济学科发展历程中反思我们的学术走向,为中国经济学科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更为广远和辽阔的历史视角。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作为中国综合性大学中最早的经济学科,它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以及所走过的道路,必然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科发展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1917 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奠定了百年北大的精神基调。今天,我们庆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创建 100 周年,也要秉承兼容并包的创新精神,在继承北京大学经济学科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吸纳世界前沿的经济学成果,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经济学人应有的贡献。

2012 年 1 月 15 日

目 录

周炳琳教授的生平	1
周炳琳与北京大学	14
周炳琳与恩师蔡元培	23
马寅初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	31
赵迺抃教授的生平和学术	55
杂忆北大经济系顾孟余主任	82
陈岱孙教授的成长道路和学术贡献	84
蒋硕杰教授的生平和学术	109
怀念恩师周宪文教授	142
狄超白传	145
李大钊同志与北京大学经济系	150
忆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邓拓同志	153
忆沈从文教授	158
忆季羨林教授	162
薛暮桥教授和北京大学	164
许德珩教授	171
深切怀念吴恩裕教授	175
悼念严仁赓、叶逸芬夫妇	178
杂忆毛子水馆长	180
杂忆胡适校长	182
周炳琳教授和胡适教授的友谊	188
回忆熊正文教授	199
艾思奇同志与北京大学	202
东厂胡同忆旧	207
后记	209

周炳琳教授的生平

周炳琳(1892—1963),号枚荪,浙江黄岩人。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副秘书长、北京大学校友会会长等,解放后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

五四运动健将

周炳琳于1912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黄岩县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1920年夏,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系(这时经济门已改称经济系)。

在北大求学时期,适逢五四运动。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及其前后的各种活动。

1918年10月他和邓中夏、许德珩等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教授为导师。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由周炳琳、许德珩、邓中夏等轮流担任编辑部主任。

周炳琳于1919年12月从英文《双周》(*Fortnight*)杂志上将亨利·埃默雷的《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一文译出,在《国民》杂志第2卷第1期上发表。该文中讲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万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罢!”、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列宁的回国和他的基本思想等,回答了“鲍尔锡维克主义和鲍尔锡维克派到底是怎样的”等问题。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周炳琳参加了,并被选为《少年中国》月刊第一组编辑员,协助编辑主任李大钊编辑《少年中国》月刊。他在1919年10月出版发行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上发表《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一文,主张男女教育平等和向妇女开放大学之门。他又在1920年元旦出版发行的《少年世界》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一文。文中讲到五四运动的经过、五四以后北京学生的活动等。在《少年世界》第1卷第2期上,周炳琳发表了《1919年秋季开学后的北京学生界》一文。文章论述了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运动,号召“青年呀!奋斗!牺牲!实地做去!”要求“‘分担工作’和‘分取所获’”(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实现共和”。

1919年3月他和邓中夏等14位同学,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

团”，他被推选为文牍干事和编辑干事。讲演团组织北大同学到北京东西南北四城讲演。周炳琳的讲演题目为《什么是国家？》、《山东与全国的关系》、《没有‘命’》等等。1920年3月，周炳琳等召开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干事会，会上议决：将四城讲演扩大到北京郊区的工厂和农村。

1919年5月3日蔡元培校长将北洋政府已经密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透露给北京大学学生周炳琳等。他们都极为愤慨，竭力反对签字，晚上在北大三院礼堂紧急集会，决定联络各校于4日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4日下午北京各校同学在天安门前召开大会，会后经中华门欲往东交民巷美、英、法三国使馆交涉，但被东交民巷西口的中国警察所阻。交涉了半个多小时，仍不许通过。游行队伍改往总布胡同外交部，大门已紧闭，转往附近赵家楼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他们在大门外痛骂亲日派曹、章、陆等。守卫在门口的警察同情学生的正义行动，他们和周说：你们的行动很好，我们不干涉，但是你们要小心啊！墙不高，有同学爬进去打开大门，同学们冲到曹汝霖的卧室。曹仓皇躲入卧室旁的箱子间里，同学们缺乏经验，未能抓到曹。这时，躲在地下室锅炉房里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听说起火，跑了出来，学生们将他痛打一顿。同学们认出卖国贼章宗祥，是因为在前门外廊房头条的照相馆橱窗里，陈列有他和其他官僚们的照片。

在五四运动中，周炳琳曾担任北大评议会临时评议长（见上海《申报》1920年3月2日），北京大学学生会秘书、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等。1919年6月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成立，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兼秘书，主持编辑《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

1919年夏，他和北京学生代表在上海讲演，声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不彻底，我们要的是彻底的革命。孙中山先生在下面听了为之热烈鼓掌。后来，他们到孙宅谒见孙中山先生，孙说：“我以前的革命是不彻底，今后要进行彻底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必须要有武力。你们要彻底革命的跟我来！我这里炸弹也有，手枪也有。”（《观察》周刊1947年第2卷第12期第16页）

邓中夏等于1920年3月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周炳琳曾参加发起。

“五大臣出洋”

我国的爱国的民族资本家穆藕初1920年向北京大学捐银五万两，作为选派学生赴欧美留学的费用。他将选拔留学生的事委托给蔡元培校长，请他“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派送之”。

当时，蔡元培校长经过认真研究，并同胡适、陶孟和、蒋梦麟商定，选拔了五位北大毕业生，他们都是“学术和道德兼全者”，而且在五四运动中有突出表现的。计为：

段锡朋(北大商学士赴美研究经济政治学)

周炳琳(北大法学士赴美研究社会经济)

罗家伦(北大文学士赴美研究教育及比较文学)

汪敬熙(北大法学士赴美研究心理学)

康白情(北大文学士赴美研究文学社会学)

(《北京晨报》1920年6月30日及7月1日)

经蔡元培校长选定的这五位学生领袖的出洋,一时被学生界仿照清末光绪年间“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历史事件,称它为学生界的“五大臣出洋”,曾经轰动一时。这种说法是寓有讽刺意味的。

5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民主人士时,在门厅迎接到周炳琳时还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呀!”

他先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社会科学理论。1922年周炳琳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转赴欧洲,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做研究生,研究社会哲学、经济学和经济分析方法等。这时,他开始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生兴趣,后来曾对经济史加以重点研究。当时,蔡元培校长提倡多方游学,学习各国各大学的精华,而不专在一国一校攻读一个专业和学位。周炳琳又于1923年4月到法国巴黎,注册入巴黎索邦大学研究政治学、法学。他还曾留学德国、意大利的著名大学,如柏林大学等校。

1925年,他回国在北京大学、武昌商科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并经李大钊教授介绍参加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北方支部。1931年秋,回到北京大学任经济系教授和法学院院长。

周炳琳、罗家伦、段锡朋等,为了感谢穆藕初先生的资助,于1937年效法穆先生作育人才的义举,集资设立新的“穆藕初奖学金”,以奖励大学读书青年和纪念穆藕初先生。1940年“穆藕初奖学金首次得奖者已决定”,农科、经济科、理科各有一名。其中理科一名为西南联大学生杨振宁(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11月3日)。杨振宁后留美成为诺贝尔奖金物理奖的获得者。他是我国首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学者之一。

出任教育厅长和教育部常务次长

1934年春,华北在日军威胁下处于特殊状态,南京政府教育部指定周炳琳担任河北省教育厅长,要他注意使河北青年免受日寇的奴化教育。周应命到天津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整顿河北各院校,争取增加教育经费,购买爱国图片分发各地教育馆。在第18届华北运动会上,他宣称当此国难时期,要锻炼身体、发扬国力、建设国防、复兴民族。他还以教育厅厅长的身份发表广播讲话:“在华北这种局面下还是要锻炼身体建设国防。”这些竟都被华北日军作为周实行排日教育的罪证,向华北最高负责人黄郛提出抗议,要周认罪和下台。

周拒不屈节，向于学忠省主席辞去了河北省教育厅厅长职务，于年底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和法学院院长。

1935年华北有少数汉奸假借民意，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实行卖国阴谋。周炳琳竭力反对此种分裂行动，他和傅斯年一同起草并于12月2日发出《国立平津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宣言》。同日，周炳琳与傅斯年又一同起草，并发出《平津国立院校全体教职员通电》，要求：“制止此种运动，以保领土，而维主权。”（《国闻周报》1935年12月第12卷第48期）

1936年北京学生掀起反日爱国的“一二·九”运动，学生游行受到镇压后宣布罢课。他既认为反对华北政权特殊化是有必要，但又认为罢课会影响学业和学校秩序而加以劝阻。

1937年春，经蔡元培推荐，周炳琳出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在任期间，遇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强迫北京各大学解聘进步教授之事。他认为大学应有一定的学术自由，聘不聘教授的权力应归大学校长，作为上级的教育部只能撤换校长，而不能解聘教授，顶住了党部的这一无理要求。在任期间，他曾给曹禺的剧作发奖，鼓励青年作家。解放后，曹禺和巴金结伴来到北大教授宿舍看望周，对周执弟子之礼，十分尊敬。

惠赠礼物给刚到陕北的毛主席

周炳琳和毛主席的政治观点虽然不同，但周是一向尊敬和关心毛主席的。周炳琳夫人魏璧、许德珩夫人劳君展是早期新民学会会员，曾同毛主席一起参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36年毛主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一起商量给毛主席选送些陕北急需的东西，并由魏璧、劳君展在张晓梅的陪同下，坐洋车（人力车）到东安市场选购了一批金华火腿、怀表（当时那种只有会移动的阿拉伯数字而没有时针和分针的怀表）和布鞋，用周炳琳、许德珩、魏璧、劳君展等人的名义，委托在北京的中共地下党人邢西萍（徐冰）教授和夫人张晓梅设法，同其他物资一起用一辆卡车送往陕北给毛主席。毛主席收到后，曾回信表示“衷心感谢”。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的共同的旗帜！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936年]11月2号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周炳琳收到从延安送来的在大生产运动中编织的有梅花鹿图案的羊毛地毯一块，作为答谢。

抗战时期组建西南联大

抗战爆发后，他建议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他的夫人魏璧是长沙人，他们比较熟悉长沙的情况。他和教育部长王世杰商定，筹办长沙临时大学并经手办理了有关的各种公函和派令等文件。

南京沦陷以前，他先乘水上飞机到汉口筹划将教育部迁往汉口。不久武汉吃紧，他又率领教育部职员从汉口乘江轮迁往重庆。在轮船上听到陈立夫被新任命为部长的消息，他就立即去电辞去教育部常务次长的职务。

他奉命整顿中央政治学校。他先到湖南芷江视察中政校，提出整顿计划，经蒋介石核定后被任为中政校教务主任。中政校是国民党培养党政干部的一所学校，由蒋介石兼任校长，陈果夫为教育长。中政校后来迁到重庆南温泉，他在那里主持教务工作，按照西方自由教育的思想进行整顿，聘请有真才实学的马寅初、贺麟、任继愈等人到政校任教或讲学，与陈果夫的法西斯教育思想相对抗。陈果夫主张中政校教授必须由国民党党部委派，周炳琳则竭力反对，主张由学校聘请。他终于因与陈果夫发生严重矛盾而愤然辞职，于1940年回到西南联大。

回到西南联大后，他仍任经济系教授，开设“经济理论”、“欧洲经济史”等课程。他还曾任法商学院院长，并曾多次担任联大教授会主席。

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由北大、清华、南开大学的三位校长组成，由于蒋梦麟经常不在昆明，往往由周炳琳代理。常委会主席一直由梅贻琦担任。1945年梅贻琦赴重庆商谈教育复员工作，常委会主席职务请周炳琳代理。这时，昆明发生了11月25日晚反内战时事演讲会遭到军警包围和开枪恐吓的事件。学生愤起罢课，周认为学生罢课抗议是正义的行动，表示支持。他于11月26日作为联大常委会代理主席，签发了《西南联大致教育部长朱家骅急电》，报告25日时事晚会遭到“军警在本校四围施放枪炮，断绝交通”的情况，要求“派员来昆彻查”。（《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页）周炳琳受联大教授会的委托，牵头起草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11月25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对此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之抗议”。（《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9页）

1945年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周炳琳声泪俱下地表示哀悼死难同学，支持正义的学生运动。认为蒋介石应该下“罪己诏”。他于12月2日签发了《西南联合大学致教育部长朱家骅快邮代电》，报告“一二·一”惨案实况，并要求“钧座来昆，亲加处理”。（《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一二·一运动》，中共

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74 页)他受联大教授会的推派,于 12 月 2 日参加四烈士的入殓仪式,并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联大教授会委托周炳琳牵头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起草《西南联大教授会为控告杀人罪犯李宗黄、关麟征等告诉状》,控告“一二·一”惨案的罪魁祸首。在《告诉状》中写道:上述被告人,“败法乱纪,罪大恶极”,“创历来学潮惨案之记录,举过去万恶军阀所不敢为者”,“苟不严惩,国将不国”。要求依法审判,严惩凶手。他于 12 月 10 日为联大教授会起草和签发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之公开声明》,向报界报告事实真相,要求“共同主持公道”。(《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6—139 页)

在联大教授会上,周炳琳提出的教授罢教 7 天的主张,得到多数教授们的赞同,并且通过了教授会决议:“停课七日对死亡同学表示哀悼,对受伤教授同学表示慰问,对地方当局横暴措施表示抗议。”中共中央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于 1945 年 12 月 9 日的社论《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荣》中认为:“联大全体教师罢教一星期以响应,更是过去任何一次学生运动中所未曾有过的。”

在国民参政会上支持中共、反对独裁统治

抗战时期,他作为“各界信望人士”,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参加国民参政会。1938 年又被选为驻会委员,1939 年他又担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在参政会上,他要求“淬励民主法治之精神,确定民主法治之制度”,“政府体制应民主化”,“政府行动应法律化”等等。(重庆《新华日报》1939 年 2 月 24 日)

1943 年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他被指定为会员。在会上,他提出一个要求政府充实人民基本权利的提案,认为“各党各派应一律有合法存在的地位。现在除了国民党外,其他党派都只是事实上的存在而非合法的存在。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应该消除。”(重庆《新华日报》1944 年 9 月 22 日)

在国民参政会上,他主张国共两党协力抗日,反对反共,主张联合苏联,反对反苏。在邵力子任参政会秘书长时期的一次参政会全体会议上,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通过了恶毒攻讦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致使中共参政员愤而退席以示抗议。周炳琳当即在参政会大会上作了义正词严的发言,斥责国民党政府发动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围攻中共的恶行。会后,周又邀同部分参政员,同往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慰问中共参政员。事后,周恩来派办事处工作人员徐冰等驱车到沙坪坝南友新村周炳琳寓回访,答谢他在参政会上的仗义执言,并且和他长谈。

在国民参政会上,他还曾多次批评蒋介石的内外政策,指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混乱”,国民党的统治必将失败。他要求对外和苏联建立友好的邦交,对内循政治途径解决国共两党问题。蒋介石在会上听了很生气,认为不能说国统区“政治混乱”。接着,国民党的御用参政员们在周炳琳发言时大叫大骂,大

吵大闹,使他无法讲下去。有的参政员还攻击周炳琳是“诋毁元首”,提出要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

1947年国民参政会将在南京召开时,他于5月6日致函邵力子秘书长,请派飞机前往迎接共产党参政员来京参加参政会。至于他本人是否出席参政会,他表示:“如参政会能讨论到和平问题,为解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愿赴京出席大会。”“如果光是去开会凑一凑热闹,大可不必。”他又宣称:“谈和平,一定要先停战才可以,否则一面打仗,一面谈和平,事实不可能。”(北平《益世报》及天津《大公报》1947年5月16日)邵力子于1947年5月14日复函周炳琳,认为:“中共……恐难有良好之反应。”“并盼早日命驾来京。”(天津《大公报》1947年5月15日)由于国民党政府没有停止内战,共产党参政员未出席参政会,周炳琳就拒绝赴南京出席参政会。从此,他再也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大学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亲自到重庆举行国共谈判。周炳琳十分欣慰,希望谈判成功。1945年10月他和张奚若教授一同起草,并同朱自清、李继侗、吴之椿、陈序经、陈岱孙、汤用彤、闻一多、钱端升共十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提出对于国是的主张,要求立即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他们还要求“迅予纠正”蒋介石“一人独揽之风”,摒弃“昏庸者、贪婪者、开倒车者”,反对“军人干政”,“严惩叛国奸逆”,并且认为这四项是“今日当务之急”,应“立即施行”。(《国立西南联大十教授为国共商谈致蒋介石、毛泽东两先生电文》,昆明《民主周刊》1945年10月17日第2卷第12期)

在解放前的旧政治协商会议时期,他渴望会议成功,并且主张限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旧政协后期,他被政协推定为军事考察团代表,又被政协推为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专家。(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14日、2月8日)他同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秦邦宪等共产党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宪法草案的修改问题。

1945年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他曾制定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的纪律,因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傅斯年推荐由周炳琳代理北大校长,周则表示“不肯居负责的地位”。他和北大几位元老联名去电美国请胡适回校担任校长。他并致函傅斯年校友,请他在胡适到校前回校代理校长。傅斯年曾于1945年9月28日复函周炳琳,表示“盛情热心感佩之至”。(原函现存北京大学档案馆)

在北大,他还协助胡适校长处理别人不敢过问的种种棘手的问题。正如曾经代理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1947年6月19日致周炳琳函中所说的:“现在北大的局面,尤其是适之先生在那里受苦,兄比任何人负责都多。”(《胡适来往书信》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0页)

吊唁叶挺将军,主祭闻一多教授

北伐名将新四军军长叶挺,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的严正交涉下,于1946年2月出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重庆举行欢迎宴会,邀请周炳琳、魏璧夫妇作陪。席上,大家叙旧,非常欢喜和融洽。不意两个月后,叶挺等在飞往延安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周炳琳闻讯,极为悲痛,当即握笔致函周恩来深致吊唁。信中写道:

恩来先生大鉴:

此次飞机失事,贵团同志,男女老少,殉者十余人,闻悉之后,痛悼殊深。忆两月前,足下与邓颖超女士邀宴,弟偕内人魏璧女士,得与其盛。席间话旧,欢洽逾恒。王若飞先生、秦博古先生、邓发先生,当日皆在座,扬眉姑娘活泼可爱,博古先生同出席于宪草审议会议,接谈尤频。今则诸人已逝,倏焉隔世,人生真若朝露,聚散尤叹无常。尚乞志悲风劲草之喻,益加迈进,努力促成全国团结,循和平道途,以救中国。死者殉道,生者衔哀,牖启是珍,道将益见发扬,是固全国人民之愿望也。专函致唁,并陈恫忱,死难诸先生之家属,并望代为一致慰。临颖神驰,不尽欲言,诸惟亮家,为前途珍重。顺候道安!

弟周炳琳敬上

[1946年]四月十七日

周恩来读了这封信以后,将它发表在中共中央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1946年4月21日上。

1946年春,西南联大在昆明宣告结束,恢复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建制。7月间他在重庆南友新村中候机回京时,听到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消息,极为悲愤。他于7月17日致函梅贻琦,要求追查此案。信中写道:

黑暗势力滋长,一多继李(公朴)后殒命、此案应追个明白,谁实指使,必令负杀人之责任,决不可开个追悼会拿死人做文章,做了文章便了结。先生似可告霍揆彰(云南警备司令),责任所在,不许马虎。

(《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0—1091页)

周炳琳又联合联大复员路过重庆并滞留在重庆的33位教授们,以快邮代电形式,致南京政府教育部朱家骅部长,要求追查凶犯及主使。要求:“缉凶归案,严究主使。”(清华大学档案室藏,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7月28日有报道)

1946年7月28日,重庆各界人士六千余人隆重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大会请周炳琳担任主席团成员和主祭人。会上,由周炳琳报告闻一多的生平。他讲述了他同闻先生从五四运动以来认识的历史以及闻先生的事迹。他最后说:

近三年来,为了政治的使人无可缄默,他于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尽力呼吁。

自己毫无私图,议论不怕激烈,因此闻先生竟遭人之恨而牺牲了。闻先生的学识与为人使我佩服到极点。现在我们就国家的元气上说,就人道上说,就是非上说,我们纪念闻先生不是闻先生一人死的问题,而是如何承担闻先生未完成的事业继续下去。

(《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96 页)

呼吁立即停止内战,支持和劝导正义的学生运动

在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此伏彼起地冲击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使“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对于正义的学生运动,周炳琳既表示要加以支持,又担心发生不幸的事件而加以劝导。

在 1946 年底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他与北大教授共 48 人于 12 月 30 日联名致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先修班女生的暴行,要求“迅绳以法”,“保证此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北京《经世日报》1946 年 12 月 31 日)

在北京各校学生面前,他慷慨激昂地大声疾呼:“党派必须退出学校,而国民党应首先退出!”当他的身影出现在北京大学大操场上时,各校同学向他高呼:“拥护周先生,恢复五四精神!”(上海《文汇报》1947 年 1 月 5 日)他这一时期的言论,影响了许多青年学生。如,1947 年“六二”惨案中武汉大学牺牲的烈士在所遗留的书信中,就曾提到周炳琳教授如何说等等。

1947 年 5 月 3 日北大历史学会举办五四历史晚会。他对着红楼操场上的数千同学讲了《对于五四的怀念》,号召青年发扬五四精神,并就国民党政府将青年节改为 3 月 29 日一事指谪说:“五四是一个青年的节日,而现在竟然连节日都吝啬地不肯给青年。”(上海《观察》周刊 1947 年第 2 卷第 12 期第 16 页)

1947 年 5 月 20 日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他十分担心同学们的安全。那时,北京警备司令陈继承是不会听他的劝告的。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虽是北大校友,也是不会听他的劝说的。北大校友何思源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责成何思源市长一定要保证参加大游行的同学们的安全。当时反动军警曾在道路最狭窄的西单路口埋伏,准备袭击游行队伍,经过何思源的多方责令,才在游行队伍将到达时撤除。

“5·20”大游行后,周炳琳和北方各大学教授共 585 人,于 5 月 28 日联合发表《呼吁和平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认为:今日的经济危机是长期内战的恶果,“唯有立即停止内战,以诚意谈判,并实现和平,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天津《大公报》1947 年 5 月 29 日)5 月 29 日他又同钱端升等北大清华教授 102 人,联名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认为参加游行的青年学生“情绪热诚,精神勇敢,行动严整而有规律,动机天真纯正”,而“某些当局措置失当,有纵容暴徒摧残学生之嫌”。(天津《大公报》1947 年 5 月 30 日)

拒绝参加伪国大

1946年周炳琳被指定为“国大代表”。这时,他对这个“国大”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坚决拒绝参加。当时的《大公报》在新闻报道中,以“周炳琳、许德珩在平对记者谈国大问题”为大标题,写道:他们“一致声称:愿参加一个代表各方面的国大,深恐参加了这样一个国大(按指伪国大),会增加分裂的可能。”“周院长……他在一年多以前,已在参政会上指出政治混乱之可怕,到今天似已感无可奈何。”(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3日)南京政府一再来电催他们前往参加,他们都拒绝去南京参加伪国大。

周炳琳还不断劝说胡适不要出席伪国大,他于1946年11月9日致函胡适,信中写道:

适之先生:

闻先生即将飞往南京准备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0页)

他还到松公府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中加以劝阻,并同胡适争吵得面红耳赤。可是胡适不听劝告,前往参加,并在伪国大上作为主席将通过的伪宪法双手捧交给蒋介石。

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多次为文或联名发表宣言,抨击蒋介石的反动措施,要求政治民主化,希望“国共纠纷循政治途径去解决”。不过,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民主化并不抱希望。

1947年8月,他与陈岱孙教授等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指出:“此方案对于过去种种错误,未尝虚心检讨”,“对于目前经济危机,并无救治之能力”。(天津《大公报》1947年8月28日)

1947年秋,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他深为不满和愤慨,他起草并领衔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意见书,由北大清华燕京三校共48位教授签名,力斥政府的严重错误。指出政府压迫民盟之举是“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一不合作,遂谓之‘叛’,稍有批评,遂谓之‘乱’,又且从而‘伐’之。试问人民之权利何在?人民之自由何在?”他们认为:“对一个持异见的在野政团如民盟者横施压迫,强加摧残,这是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举动。”因此,“义之所在,不容缄然”。要求政府“对于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一事,应当重作决定。”(《观察》周刊1947年11月8日第3卷第11期)

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

1948年周炳琳和钱昌照等人在北平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3月

1 日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周炳琳提议推举钱昌照为临时主席,大会选举周炳琳、钱昌照、吴景超、萧乾、潘光旦、刘大中、钱端升、陶孟和、王崇植、楼邦彦为理事;邵力子、吴蕴初、童冠贤为监事。(天津《大公报》1948 年 3 月 2 日)他们企图把第三种力量组织起来,走第三条道路。该会出版发行《新路》周刊,由周炳琳、吴景超负责编辑。

他在《新路》周刊上,写了不少评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抨击国民党政府以“戡乱”为主要内容的倒行逆施的施政方针。他指出:“内战坑杀了成千成万中国人民。”他指谪蒋介石 1948 年 1 月 8 日的讲话,是“一篇暴露他不恤人民的痛苦,只逞自己的凶残之演说”。是“文过饰非,残民以逞,莫此为甚”。是“不顾人民死活,一意孤行,是为残忍之尤”。他写道:“恭读这篇演说词之后,不禁喟然叹曰:英雄昂首,小民悉为灰烬矣!”他反对政府发行新纸币和大额关金券,主张让有钱人出钱。他反对 1948 年 8 月政府设立特种刑事法庭和于 19 日来拘传学生。他指出:“迫害有无罪案及罪案能否成立均无从判明之青年”,“更用包围及封锁迫使各校接受宪警入内行其‘象征式’之搜查,故意损毁学府之尊严”。他评论道:“是役也,狞恶之面目揭露,使中年人摇首,使青年人寒心,直接迫害者三百数十人,驱而至其所向,驱而流于四方;学府遭蹂躏,志士求溺雪;过去争取青年,今日残害青年,使缅怀往事者深感失败主义之已攻入昔为亡命客今为南面王的人士之心脏,非狞恶之可怖,惧覆亡之无日。”

1949 年 8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给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分子“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92 页)这时,周炳琳才如梦初醒般地认识到:“第三条道路虽然不满意于蒋介石的统治,但还是反对中共反对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就是希望在中国有民主个人主义者出来,走第三条道路,作为它的反共反人民的工具。”(《1952 年思想检查》)

1949 年初,北京解放,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宣告解散。

在北京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北京大学南迁,这时周炳琳对南京政府已经绝望,他坚决反对北大南迁。1948 年底,北京围城中胡适校长单身一人从南苑乘飞机去南京。1949 年 1 月南京政府派飞机到南苑机场接所有的北大教授南下,周炳琳同绝大多数教授们一样,没有登机南下,留在北平等待解放。

解放后参加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

1949 年 2 月 2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京大学,次日他致函汤用彤校务委员会主任,要求辞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等行政职务,专任经济系教授。

不久,周恩来来到北大子民纪念堂同教授们谈话。周恩来几次提到周炳

琳,并对他在重庆时对中共代表团的帮助表示感谢。周炳琳的态度却很冷淡,他在《1952年思想检查》中写道:“我原来与他相识,我本来应该在会上说几句话表示欢迎,并为人民的胜利庆贺。但是我总是踌躇不前,一言不发。”

北京解放后,党和人民对他进行了不断的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如发展他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先为中央团结委员,后为中央委员。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后,让他担任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后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又经张奚若介绍参加了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1951—1952年北大文法学院有机会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团,他报名参加,被分配到广西土改委员会第一工作团,任团委。通过广西土改,他提高了对阶级斗争和地主阶级本质的认识。他说:“广西的地主是坏,有许多恶霸须要枪毙。”

在人民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面前,他却在思想上抱有一种“自处之道”,即:他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可是他自己和国民党有过一段历史关系,此时不能忘掉过去而背弃它。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起初抗拒思想改造,顽固得有如“铜墙铁壁”。他成为全北大思想改造中的重点人物。经过小会、大会的检查和批判,重点是批判他的“自处之道”。师生们对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帮助他提高认识。

可是,他的多次检讨,均因内容不够深刻,得不到师生的谅解,未能通过,成为北大思想改造中的重点人物。这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给毛主席送上一份《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其中谈到北大师生以及周先生的夫人子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他的帮助和批判。毛主席当即于1952年4月21日写下了一段批语:

彭真同志:

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22页)

1952年7月30日周炳琳在北京大学沙滩新膳厅的千人大会上作了第四次大会检讨。这道铜墙铁壁终于被攻破了。他在检讨中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也认识到他解放后的“自处之道”是敌视人民的,“我这一反动的态度,妨碍了自己靠拢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表示要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我决心贡献我的余年来为祖国的建设尽我最大的努力”。他的检讨,得到群众的谅解,而被通过。

思想改造后,他撰写《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一文,在《人民日报》1952年10月9日上发表。文中写道:“新中国在政治